

大国博弈视阈下的联合国秘书长遴选机制

张鹭远¹, 张京斗², 杨 军¹

(1.保定学院 政治文化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0; 2.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联合国秘书长作为联合国首席行政长官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其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历任秘书长的遴选都充斥着大国政治的身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在大国政治相互碰撞与妥协的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秘书长遴选机制与规则。

关键词:联合国秘书长;常任理事国;大国博弈;遴选机制

中图分类号:D523.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6-0039-07

2016年10月6日,安理会通过关于提名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决议。2016年10月13日召开了第71届联合国大会,所有会员国代表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了对葡萄牙前总理、联合国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的任命决议。古特雷斯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秘书长的简称。作为世界上最大国际组织的首席行政长官,同时也是联合国其他5大部门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庭的“最高行政首长”,从而成为联合国的象征。虽然他不是国家行政首长,但享有“准国家领导人”的崇高外交礼遇。由于其在联合国事务中的重要性及其独特的作用,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人称之为“世界的总管”抑或“世界总统”。其实秘书长并非“世界总统”,亦非世界领袖身份。第4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这样评价:“秘书长是世界上最迷人又最使人丧气的差事,包含着人类期望的高峰和人类脆弱的深渊。”老布什也曾说“应当对瓦尔德海姆的当选表示同情,而不是祝贺”。自联合国建立伊始,除了初期英国人格拉德温·杰布短暂代理秘书长外,已有8人担任秘书长,他们是挪威的赖伊(1946.2—1952.11)、瑞典的哈马舍尔德(1953.4—1961.9)、缅甸的吴丹(1961.11—1971.12)、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1972.1—1981.12)、秘鲁的德奎利亚尔(1982.1—1991.12)、埃及的加利(1992.1—1996.12)、加纳的安南(1997.1—2006.12)和韩国的潘基文(2007.1—2016.12)。按国际惯例常任理事国的公民不能出任秘书长一职,但可以担任副秘书长,五个常任理事国均占据一个席位。作为联合国的代表,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任命。但前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任命实质上是一

收稿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式选举民主困境视阈下的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研究”(HB16ZZ001)

作者简介:张鹭远(1970-),男,河北保定人,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

个“在五大国严重操弄下的迷宫般的复杂过程”^[1]。因为秘书长的产生是五大常任理事国大国博弈的结果,秘书长人选的遴选更多是大国政治相互碰撞与妥协的产物,更多不是为了选贤任能,而是要服从于“政治正确”。因此,本文没有采用“秘书长选举”一词,而是用“遴选”“推举”或“推荐”来代替“选举”。

一、大国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的战略博弈

联合国作为普遍性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已成为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国政治的重要舞台。联合国秘书长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其行政长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凸显出来。由于秘书长的遴选属于实质性问题,而非程序性问题,这样五大国权力在人选问题上具有决定性的。历任秘书长的遴选都充斥着大国政治的身影,数十次的否决权运用折射出大国在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的激烈利益碰撞。在历任的秘书长推选中,各个国家都把秘书长人选是否对本国有利、是否符合本国的外交政策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2]。

(一)初期在秘书长遴选中的美苏两大国博弈(1946—1971)

1. 早期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法律规定

联合国秘书长职责和遴选机制是在大国竞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最初由于大国意见分歧,有关秘书长的任期及能否连任的问题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没有予以明确。1944年8月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曾提出任期3年的提议被搁置。1945年4月旧金山制宪会议上,中小国家主张秘书长由直选产生,遭到美国抵制。美国认为秘书长负有重要政治职责,要发挥重要作用,须得到大国信任。直至1946年1月24日的联大11(I)号决议规定确认:“首任秘书长任期5年,期满时可以连任1届”;同时宪章第97条和联大11(I)号决议的补充说明规定秘书长的任命必须先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经大会到会投票会员国的简单多数票认可才能决定。安理会推荐须有7个(1965年联大通过后改为9个)以上理事国的赞成票,其中5大国不能有否决票。为了避免大国矛盾公开化和掩盖政治敏感度,安理会讨论秘书长人选采取了秘密会议及秘密投票的方式。虽然据法理而言联大可以否决安理会的推荐,但实践中安理会推荐后,被大会否决的情况还从未发生。所以候选人只要获得安理会推荐,便可获得联大的认可从而成为秘书长。

2. 前三任秘书长人选的美苏较量

冷战期间,美苏都想控制联合国,发挥其“安全阀”的作用,这样安理会时常因美苏关系对峙而陷入瘫痪。第1任秘书长和第2任秘书长人选问题斗争非常激烈。1946年,曾任挪威外交大臣的赖伊首先被苏联相中并推荐,同时被主导联合国事务的美国所认可,在美国和苏联的支持下顺利成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可是,处于美苏权力夹缝中的秘书长终归扮演了吃力不讨好的角色。1950年赖伊任期届满谋求连任,得到美国支持,但因朝鲜战争中,支持美国干预朝鲜的议案开罪了苏联,遭到苏联的强烈抵制。为此安理会五次会议难以对新的人选形成一致意见。安理会把问题交给联大,但遭到苏联的反对。之后美英法等国延长秘书长3年任期建议通过,这导致苏联一直未承认赖伊秘书长的合法性。在1952年11月,赖伊终因麦卡锡主义和美籍公务员问题又遭美国诟病,这样在美苏的联合反对下赖伊被迫辞职。可见,赖伊担任秘书长期间,支持美国操纵安理会,特别是支持朝鲜问题国际化违背了联合国的宗旨,损害了联合国的声誉,不仅遭到苏联的反对,最终也被美国所抛弃。

赖伊下台之后,安理会对3位候选人进行投票都未通过。菲律宾的卡洛斯·罗莫鲁和波兰的斯克雷斯泽夫斯基未获得9票;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森遭到苏联的否决。美苏斗争的结果是:在1953年法国提议中立国瑞典的副外长哈马舍尔德为人选,经安理会的推荐成为联合国第2任秘书长。他自己当时也不知获得推荐,以至于后来哈马舍尔德坦言是被“偶然”选上的。

但在哈马舍尔德在任后期,苏联认为他在刚果危机上处理不利,赫鲁晓夫把他说是“坚定维护

美国利益”,是“资本家的一个代表”,甚至被苏联媒体称为“双手沾满鲜血的虚伪政客”,受雇于“殖民分子联盟”,可见他已成了苏联领导人眼中的“头号敌人”。1960年15届联大上,苏联提出废除秘书长的“三驾马车”体制,即社会主义、西方国家和和平中立国家各派1名代表取代现行的联合国秘书长机制^[14-15]。哈马舍尔德认为如果辞职有利于联合国,他本人可以马上辞职,但他认为苏联的做法欠妥,在美国的支持下,他和苏联出现了僵持。

1961年9月,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失事意外罹难,危机得以意外缓解。美苏在新人选问题上,经过6周的争论和利益碰撞,双方接受了一个地位和权力不断变化的临时秘书长方案,最终安理会推荐以稳健著称的吴丹成为代秘书长。由于吴丹很好处理了古巴导弹危机,低调慎重的风格赢得美苏好感,这使得他不仅使自己很快去掉“代”字,而且成功连任。

(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美国的阻挠及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之后,本来有望解决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被无限地搁置起来。在20世纪60、70年代,国际风云巨变,第三世界作用加强,在吴丹秘书长的支持下,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内外条件成熟。1971年9月21日,联大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吴丹秘书长第2届任期满后主动放弃再次连任,这样新秘书长又成为关注焦点。经过几轮安理会意向性投票,最后锁定两位竞选者:非洲支持的坦桑尼亚人萨利姆和美苏支持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刚刚恢复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中国的作用凸显出来,中国政府认为欧洲已有2位秘书长,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士担任秘书长。由于萨利姆遭到4大国的反对,基本失去了成为秘书长的机会,加之奥地利政府表达了渴望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顾全大局,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态度转变。这样,在1971年12月21日,瓦尔德海姆经过安理会7次秘密投票后,最终获得推荐成为联合国第4任秘书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联合国秘书长问题上发挥重要影响。

中国回归联合国后,坚决支持由亚非拉国家代表出任秘书长及后来顾全大局的态度,使新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印象十分深刻”^[9]。如果说,在瓦尔德海姆第1、2次推荐中中国展现了更多的灵活性的话,那么,在他第3次参选中,中国则是表现了自己坚定的原则性。从联合国秘书长的推选情况看,完全被美苏两超级大国所操纵,美苏心仪的候选人最终都成为秘书长。虽然瓦尔德海姆是个优秀的政治家,并再次获得美苏英法四大国的支持,同时中国政府对他也无恶感,对他获得安理会推荐非常有利,但广大亚非拉国家希望联合国摆脱美苏操纵,期待中国有所作为,站在维护发展中国家一边。综合国际局势,中美较量在安理会涌动。中国坚决支持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而美国坚决支持瓦尔德海姆,双方僵持不下。

美国和中国先后16次投下反对票,否决了对方的人选。美国认为萨利姆在非洲及巴基斯坦问题上“激进”,不符合美国利益;而中国则是考虑秘书长人选的地区均衡和轮流惯例,主张应由非洲或拉美国人士担任。从表面看是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两人之间的竞选问题,实质上成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行政事务、争取平等权利的一场政治斗争^[9]。针对某些国家指责中国“制造麻烦”,邓小平传话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要“一否到底”。1981年12月3日,瓦尔德海姆坦言完全理解中国的立场,决定退选;12月8日,萨利姆也决定退选。12月11日,安理会从9名来自第三世界的候选人中,一致推荐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第5任秘书长人选。这是中美在外交上的一场“朝鲜战争”,看似平局,实则占尽天时地利的美国输了。

(三)后冷战时代大国在联合国秘书长遴选问题上的较量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处于激烈变化中,一度被边缘化的联合国地位加强,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1991年,第5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任期即将结束,第6任秘书长遴选是后冷战时代的首次,格外引人关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对立,南北矛盾,形成了秘书长不能由常任理事国公民担任和地区轮

换的惯例。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美国企图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规则,提出各国领袖包括常任理事国应有被选举权,人选也不应局限于某一地区。非洲国家坚决支持由该地区担任,因为之前没有秘书长来自于非洲。当时有 15 名候选人角逐这一职位,是历史参选人数最多的。布特罗斯·加利当选具有一定偶然性。加利的法国留学经历赢得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大力支持,同时自己打破秘书长不露面不竞争的准则,公开竞争秘书长。1991 年 11 月安理会投票结果为 11 票赞成,4 票弃权,这样,他顺利成为第 6 任秘书长。但是在 1996 年加利再次谋求连任时,遭到美国的反对。性格倔强的加利加强联合国独立性的做法与美国相左,同时在波黑、索马里和会费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同美分歧也较大。加利初任本是美国勉强同意的,美国需要一个“驯服”的秘书长,而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秘书长,美国更不愿意看到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联合国。当然,克林顿反对加利连任也是出于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为了自己连任加利就必须下台,这样加利成了美国选举政治的牺牲品^[32]。1996 年 11 月 19 日,安理会以 14 票赞成,美国 1 票反对的结果,否决了加利的连任之路。

这样,第 7 任秘书长人选问题摆在安理会面前,非洲统一组织主张仍由非洲国家推出,得到中国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勉强同意可以由非洲国家担任,安南得到美国的极力支持,但美国的霸道行径引起法国的不满,一度出现法国和美国僵持局面,直至安理会第 8 轮预测性投票仍为 14:1 时,法国第 9 轮才放弃红票否决。科菲·安南艰难地成为首位黑人秘书长。2001 年 6 月再次获得推荐连任。虽然有人诟病安南是“美国在联合国的代理人”,甚至“美国的国务秘书”,但安南以自己的作为被称为联合国“跨世纪的杰出首脑”,美国称他为最为出色的秘书长。

第 8 任秘书长潘基文胜出。他在安理会成员国意向性投票前 4 轮中,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主动退出,正式投票前史无前例地只剩下潘基文一位候选人。2006 年 10 月 9 日,潘基文得到安理会一致推荐,后经联大表决顺利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然而,潘基文笑到最后并不是想象的如此轻松。因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重提,新一任秘书长选择标准主要是能力,而不应该拘泥于地区,实际上美国再次企图打破不成文的地区轮换惯例,不同意从亚洲产生秘书长。这得到英国的支持,法国则没有明确表态。中国和俄罗斯明确支持亚洲国家的候选人,并且得到不结盟国家的支持,非洲就有 53 个国家支持亚洲候选人。当时小布什政府正在为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和朝核问题而焦头烂额。这样,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潘基文得以被推荐。2011 年 6 月 17 日,安理会 15 个理事国又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推荐潘基文连任。

二、联合国秘书长推选与连任中形成的实践规则机制

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既有《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议事规则等成文法规定的法律依据,又有形成的不成文法的习惯性的实践原则积累。从 8 任秘书长的产生过程看,基本遵循下面程序:现任秘书长任期届满之前,有意愿的参选国须向安理会通报推荐人名单,再经过由 5 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安理会秘密讨论推荐 1 人,然后提交到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共同投票,选举产生下届联合国秘书长。但是,实质上秘书长的产生还是在 5 大国控制之下。那么,秘书长遴选有哪些原则性的要求呢?具体如下:

(一)对参选人个人基本素质原则要求

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拥有:(1)公认的外交能力和丰富的外交经历;(2)具有较高的领导管理能力和协调冲突的交际能力;(3)能够熟练使用 2 种以上的联合国官方工作语言,特别是英语和法语;(4)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年龄一般不低于 45 岁,且身体健康。早在 1945 年 8 月,美国国务院提出未来秘书长应是一位为外交界所公认的有威望和能力并具有在外事机构工作经历的人,年龄在 45~55 之间,并且熟练掌握英语和法语。美国关于秘书长基本素质的建议为会员国接受,并且逐步完善成了联合国不成文惯例。第 5 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回忆录》中提出 8 项标准^[33],基本涵

盖了以上4个方面。他认为秘书长首先必须是一位能够体现《联合国宪章》的道德权威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愿意欣然忍受世界上强势人物或弱小人物怪癖的有耐心的人。善于协调同大国特别是5大常任理事国的关系,秘书长赖伊、哈马舍尔德和加利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特立独行的加利只担任了一届秘书长。现在联合国有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6种官方语言,要成为秘书长至少要熟练掌握包括英语和法语在内的2种以上语言。加利成为秘书长得益于在法国的留学经历,深谙法语使他得到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大力支持,这成为他获胜关键因素。秘书长年龄要求45岁以上,没有55岁的上限。加利成为秘书长时年69岁,安南60岁,潘基文第1届72岁第2届77岁。2006年秘书长选举中,约旦亲王扎伊德·侯赛因是最大的“黑马”,由于当时年龄只有42岁,最终和秘书长失之交臂。可见,联合国秘书长既要恪守遵循《联合国宪章》和惯例要求,又要发挥其主动性去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既要关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又要左右逢源,平衡大国利益。

(二)中小国而非大国原则及地区轮换平衡原则

秘书长必须来自于中小国家,而非影响力强的大国。1945年9月美国备忘录认为秘书长不应是“五大国”的国民,应由中小会员国家国民担任。虽然安理会5大国不能担任秘书长,但为了联合国工作需要,一般5大国均推荐自己国家公民担任副秘书长。自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8位外交官先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沙祖康和现任副秘书长吴红波。中小国家外交精英担任秘书长比较稳妥实在,可以很好地体现联合国的普遍性及其代表性,有利于加强会员国的团结,体现联合国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有利于大中小国家之间的沟通,有利于赢得中小国的同情,同时赢得五大国的支持,这些符合国际社会对秘书长的期望。同时大国倾向于维持联合国的现状,不希望秘书长独立性太强,所以大国为避免秘书长挑战其在安理会的主导权和特权,倾向于从国际影响力不大的中小国家选择候选人。冷战结束伊始,在第6任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美国从本位霸权国利益出发提出:各国领袖包括常任理事国有被选举权的主张,最终遭到其他国家强烈抵制而告终。

秘书长推荐的地区轮换原则已作为惯例被普遍接受与遵从,特别是在1997年联大通过的第51/241号决议作出明确规定:“在甄选和任命秘书长职位的最佳人选时,应继续适当顾及地区轮换和性别平等。”表明这一原则规定实质上已经在执行。联合国秘书长产生的实践也印证这一点。第1、2、4任秘书长赖伊、哈马舍尔德和瓦尔德海姆都来自于欧洲,第3任吴丹和第8任潘基文来自于亚洲,第5任德奎利亚尔来自拉丁美洲,第6任和第7任来自于非洲。冷战时期,联合国席位划分遵从“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的宪章规定,采用了“五分法”:即非洲国家、亚洲国家、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欧洲及其他国家(美、加、新、澳和北欧国家)。后冷战时代,这种基于冷战思维的划分方法早已过时,有人建议采用“四区法”:即非洲、亚洲及太平洋、欧洲和美洲国家^⑦。如果继续过去分法,2016年推荐产生的秘书长应来自于东欧国家。

(三)秘书长推荐的安理会“五大国一致原则”

在秘书长人选问题上,如果说上述原则更多体现的是程序和形式的话,那么“五大国一致原则”则是实质与核心。虽然有人戏称秘书长是在“跑龙套”,最大的权力是在向安理会“提请注意”,但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秘书长人选为非程序事项。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1票否决权,人选须常任理事国全部同意票才能推荐。征得大国一致同意是秘书长竞选之路上一座绕不开的“火焰山”。例如1996年加利秘书长的连任之路,以其他国家14票赞成,美国1票否决而终结。

秘书长人选一般由政府提名或参选人自荐。安理会一般按参选人姓氏字母排列顺序逐个秘密投票,由主席现场开票。如参选人超过2个以上,获9票以上且无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者即可获得安理会的推荐;如超2人获9票以上且无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则票多者获安理会推荐^⑧。安理会确定秘书长人选后,即通过向联合国大会推荐的决议,安理会发布正式公报;联合国大会择日举行正式会议表

决结果。8次安理会推荐的候选人均获得联大通过,所以获得安理会推荐意味当选。1981年安理会在推荐秘书长问题上出现僵局,中美互相先后16次直接否对方的人选。1981年以后,安理会采用联大主席奥图努的建议,推荐人选不再直接投票表明支持抑或反对,而是采用无记名预测投票制度^⑨。为了便于识别,现在5个常任理事国票色为红色,非常任理事国为白色。1996年安南获得推荐时,经过了9次预测性投票才最终胜出,前8轮一直遭到法国的红票反对。正是在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的大国一票否决,近年来有人建议五大国多数投票制,不使用单个否决权;也有人建议成立秘书长推选委员会,审定候选人资格,向安理会或大会推荐。

除上述原则之外,联合国秘书长任期一般不超过2届,同时要考虑性别均衡原则。不超过10年(2届)已形成秘书长任期的惯例。第3任秘书长吴丹虽然有机会争取第三个任期,却主动放弃;第4届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谋求第3任期,安理会投票中曾遭到中国16次否决票反对,至此再也没有谋求第3个任期的秘书长了。考虑到前8任秘书长全部是男性,今年女性秘书长的呼声越来越高,性别均衡原则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三、2016年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评析

古特雷斯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过程可以看出,秘书长的产生仍是大国政治的产物,但今年秘书长遴选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联合国秘书长参选人选择上注入了某些竞争选举因素

从第1任秘书长赖伊到第8任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安理会并不支持参选人公开竞争秘书长。参选人所在国家或他国可以主动帮助参选人获得安理会的支持,但本人不露面不竞争不积极争取成了惯例。哈马舍尔德成为第2届秘书长具有“偶然性”,这一消息也是朋友告知的。1991年加利成为秘书长时,开始了本人积极主动的争取,为了获得支持,加利本人踏遍非洲,并亲自到中国、英国和美国争取大国好感。这次秘书长遴选程序在2015年底已经提前启动,并正式邀请193个会员国提名候选人。为此,联大主席吕克托夫特还建立了秘书长“竞聘网站”,网站还有参选人的履历,还要准备2000字左右的“竞选声明”。2016年有10多名声明候选人参与秘书长的竞争。候选人将利用2个小时面对联合国代表、非政府机构、商业团体和个人代表,并回答他们的问题^⑩。这一具有竞选性质的非正式问答环节设置发挥了一定的淘汰和选拔作用。同时参选人分别出席了4月13日在纽约和6月3日在伦敦举行公开辩论活动。这些对于秘书长推荐而言都是开创性的,虽然只是初步的,但公开了参选人的名单及其履历信息,回答提问并公开进行至少2次公开辩论,提升了透明度,给安理会推荐人选做了一定前期准备和信息参考,便于安理会做好人选推荐工作。

(二)女性参选人的价值与意义凸显出来

基于前8任秘书长全部是男性,今年女性秘书长的呼声越来越高,性别均衡原则及其重要性凸显出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升,各国女性参与政治逐渐被接受,而且一些佼佼者还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如德国总理默克尔、韩国总统朴瑾惠、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泰国前总理英拉、芬兰前总统塔里娅·哈洛宁、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等。这无疑给今年的女性冲击秘书长职位打了一剂“兴奋剂”。从女性参选的数量看,已创历史纪录。

(三)地区轮换原则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

秘书长的选择一直遵循着地区轮换均衡原则。基于冷战思维的传统“五分法”:即非洲国家、亚洲国家、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欧洲及其他国家(美、加、新、澳和北欧国家)已过时了。但囊括非洲、亚洲及太平洋、欧洲和美洲国家“四区法”还未被接受。从传统地区轮换看,秘书长的热门人选应该是出自东欧国家,因为历史上8位秘书长欧洲3位、亚洲2位、非洲2位、拉美1位,还没有东欧国家的参选人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参选人中6位来自东欧地区本身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欧地区作为一

个政治敏感地区,过去是前苏联的势力控制范围,构成了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冷战后,东欧国家开始了入欧之路,与俄罗斯渐行渐远。地处俄罗斯和西欧两大集团之间的东欧地缘政治敏感,叠加乌克兰危机,该区域的候选人想要达到俄罗斯、西欧、美国和中国多方满意的确存在一定难度。

参考文献:

- [1]钱文荣. 权力走廊里的角逐[J]. 外交评论, 2006(6):41-46.
- [2]史哲. 联合国秘书长与否决权[J]. 国际政治研究, 2000(3):68-74.
- [3]张贵洪. 联合国秘书长——从赖伊到潘基文[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14-15.
- [4]吴妙发. 围绕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角力[J]. 国际问题研究, 2006(4):59-65.
- [5]苏振兰. 中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的对峙[J]. 党史纵横, 2015(11):31-35.
- [6]雷斯斯·德奎利亚尔. 德奎利亚尔回忆录[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356.
- [7]中国联合国协会. 联合国70年:成就与挑战[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447-448.
- [8]陈伟雄. 明争暗斗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J]. 领导科学, 2004(5):47-49.
- [9]王森. 联合国秘书长已有8人参选,女性能否当选成为悬念[N]. 环球时报, 2016-04-06.

The Election Mechanism of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 Visual Threshold of the Superpower Games

Zhang Zhiyuan¹, Zhang Jingdou², Yang Jun¹

(1. Centre fo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selection of Secretary General is full of big political power. It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game among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ollision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the special Secretary General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rules have been formed.

Key word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UN;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power game; selec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 石丽娟)